

巴胡母木 主编



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

II

四川民族出版社

K820
75
2:2

BD05/09

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

第二辑

主 编 巴胡母木
副主编 刘 德 仁
杨 明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一月

B 766813

责任编辑：周介生
封面设计：梅定开
封面题字：任兆祥
技术设计：杨璐璐

340

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第二辑）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75插页2字数213千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册

定价：3.65元

书号：ISBN7—5409—0253—1/k·46

前 言

祖国大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古往今来，这里人口众多的数十种少数民族同胞，以辛勤的劳动，不断地创造和丰富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祖国的西南边疆日益繁荣昌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抗击一切外来的侵略，捍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

西南各少数民族有若群星灿烂的英雄人物。他们中，既有屡建奇勋的历代民族英雄和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闻名国内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还有富于革命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及其他爱国志士……他们坚持进步，坚持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英勇战斗；勤奋学习，勇于实践，敢于创新。这些优秀品德和革命传统，可以激励我们今天更好地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为此，我们决意在西南民族学院党委领导下编写《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将原籍西南地区，或原来外籍后迁西南，以及寓居西南活动时间较长，业绩昭著影响重大的历

史人物撰写简传，分辑出书。其目的在于：第一、对读者尤其青年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期以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第三、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一点资料。

此书的编辑工作由《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编辑组具体负责。编辑组由巴胡母木、刘德仁、杨明、先毅刚、杨万全、徐明、祁和晖、曾文琼、陈泛舟等同志组成。巴胡母木任主编，刘德仁、杨明任副主编。

编写《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新工作，由于我们水平低，经验不足，缺漏、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志》编辑组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古州苗民起义领袖包利·····	刘 岫 (1)
布衣族农民起义领袖韦朝元·····	江 山 (15)
傈僳族农民起义领袖恒乍绷·····	〔苗族〕 郁 水 (26)
哀牢“夷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	草 药 (36)
哀牢起义军副帅哈尼族英雄田政·····	化 一 (52)
哀牢起义的播火人李学东·····	化 一 (68)
哀牢起义军的栋梁杞绍兴·····	化 一 (85)
“铁弹丸罗罗”杞彩顺·····	草 药 (101)
哀牢起义军的傣族首领刀成义·····	草 药 (111)
黔东南苗族俊杰李洪基·····	岳山 郁水 (120)
威震黔西的苗族起义领袖岩大五·····	刘岫 德昌 (136)
基诺族起义领袖搓约·····	白 明 (151)
哈尼族起义首领曹着·····	白 明 (159)
促进祖国统一的大师帕思巴·····	苏超尘 (163)
杰出的外交家、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刘 岫 (172)

- “饮将鲜血代胭脂”的奇女秦良玉〔仡佬族〕曾文琮 (190)
-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仡佬族〕曾文琮 (200)
- 黔江辛亥起义领袖温朝钟……………赵心愚 (211)
- 白族爱国民主人士张耀曾……………白明 (218)
- 苗族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杨维……………巴岳山 (224)
- 辛亥革命的苗族先烈王宪章……………郑萍 (238)
- 白族民主革命斗士、国防战略家杨杰〔白族〕杨明 (253)
- 在烈火中永生的司马德麟……………赵心愚 (259)
- 著名历算学家落下闳……………刘岫 (266)
- 杰出的藏族语言学家图弥桑补扎……………苏超尘 (276)
- 著名妇产科专家咎殷……………化一 (281)
- 白族文人杨黼及其“白文”《山花碑》……白明 (286)
- 明代白族学者杨南金……………白明 (291)
- 白族文士中的翘楚人物杨士云……………白明 (295)
- 清代“西南文学巨子”莫友芝……………岳山 郁水 (302)
- 近代贵州彝族诗人余若琮……………〔彝族〕余宏模 (316)
- 近代白族诗人赵式铭……………衍荪 (321)
- 《新纂云南通志》主编周钟嶽……〔白族〕张渤 (334)

古州苗民起义领袖包利

刘 岫

清初雍乾年间，包利领导贵州古州（今榕江县）苗族人民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武装大起义。这好似晴天霹雳，震撼了清王朝的所谓“升平盛世”；这好似燎原之炬，点燃了千里苗疆起伏延绵的熊熊革命烈火。

包利，苗族人，生长于贵州古州的一位普通百姓家庭。他平日以劳动谋生，并利用过阴送鬼、画符治病等手段，与四周群众密切联系，人们都亲昵地叫他“老包”。他在发动、领导起义时，不但能看清形势，而且善于抓住时机，利用宗教团结众多的苗民，在领导指挥打仗中有胆有识，才智出众，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

雍乾年间，包利领导古州苗民造反，完全是由清王朝逼出来的。自清王朝统一全国，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与巩固，相伴而至的是对人民进行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愈来愈残酷。素以“地瘠民贫”著称的边疆穷省贵州，也不例外。清王朝在这里平定了安坤之乱，清除了吴三桂的割据势力，并进行了“改土归流”。同时也相应地加重了对这里各族人

民的压迫、剥削。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同胞更甚！反动统治者充满着对广大苗民的轻蔑与仇视，竟胡说什么“苗蛮罔识义理，以睚相仇杀，累世不已……苗家仇，九世”。（《贵州通志·前事志》十八）且顽固地认为：“土苗连和，国家之害；土苗仇杀，国家之利。”并以此反动的理论为根据，在政治上施行“以苗弱苗”的策略。在经济上，清王朝于1670年令平坝县丈量土地，凡田土“四至粮额，及弓口广袤之数，悉绘于册。”（《安顺府志·卢大济传》）1691年“又令遵义府丈田增赋。”“（康熙）三十年，丈田毕，各甲造清册投递户房……秋征仍照老亩加派，每亩外加二十。据云：一亩需银一两四、五钱，有至二两者。”（《贵州通志·前事志》十八）比较原来每亩征银一钱一分至银一钱六分，米一斗一升至一斗六升，苗民负担一下增加了好几倍。以至广大苗民“田园卖尽，始而鬻卖男女，以填逋赋，更有逃亡故绝，无所著追，而粮差及（同）族代为赔垫者。”（《安顺府志·卢大济传》卷三十二）田赋之外，官役之扰亦繁，“差派苗人，竟有扣克发价，遇事鞭笞。”（《贵州通志·前事志》二十）又“兵役入苗寨，恣意需索，苗人以官奉之。道路偶有僵尸，累及数十寨苗人，少（稍）富裕者，产立破。苗人……用物少（稍）新异，兵役指为违制，苗人以贿免。”（《安顺府志·冯光熊传》卷三十一）此外，官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诸如贵阳、镇远、安顺、普安四处榷税，每年抽收一万金。思南、威宁、黔西、大定、毕节等处，还收过往牛、马、铜、盐及落地等税，每年白银八、九

千两，最低也不少于二、三千两。当时，贵州推行“改土归流”，又强迫各少数民族人民“缴军械”、“立保甲”、“编户口”、“征钱粮”、“定规约”、“设重兵”、“修城垣”、“安塘汛”……进一步从政治经济上加强、加紧对贵州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各族人民没法生活下去。于是贵州各族人民不甘忍受清王朝的残酷压迫剥削，纷纷起义反抗：1724年冬10月，定番（今惠水）、广顺“仲苗”首领阿近起义反清；1726年，广顺州梁陈屯青苗莫阿庆再次举旗抗清；1727年3月，黎坪谬冲的花苗又奋起反抗清王朝。当这些抗清斗争先后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下去后，苗族英杰包利又在古州深入广泛发动苗民掀起了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起义！

自定番、广顺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被镇压下去，贵州各地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但千里苗疆的劳苦大众并没有被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吓倒、屈服！他们含悲忍泪每时每刻都在酝酿准备发起新的斗争。1734年7月，古州苗民领袖包利，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暗中通过秘密串连，逐渐聚集革命力量，等待武装起义的有利时机。他根据苗民迷信鬼神、崇拜祖先的观念和习俗，利用宗教的形式宣传和组织群众，以“苗王出世”相号召，为武装起义大造舆论。同时又暗中把骨干组织武装起来。但不久，起义准备之事还是被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的清政府官员发觉了，立刻派出捕快将包利锁拿丢监。包利被捉，激起了古州各族人民的公愤，古州城乡人心浮动，成群结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势如箭扣

弓弦，一触即发。当局鉴于矛盾激化，暴动迫在眉睫，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被迫把包利释放。包利出狱后却更加积极地组织领导广大苗民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1735年3月，古州官府又乘征收钱粮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苗族人民，他们贪得无厌，巧立名目，穷凶极恶，扰遍村寨，鸡犬不宁，广大苗族人民忍无可忍。包利见起义时机业已成熟，便“编传木刻”，相告“苗王出世”，领导古州寨蒿、八妹、高表等寨苗族人民首先举起了武装反清的义旗。于是，如火如荼的苗民大起义又在贵州千里苗疆迅速展开。

1735年4月17日，包利与银红带领起义军攻打古州厅辖之王岭汛城。这次战斗，最初义军因准备不够充分，各地群众未及时汇齐，兵力上没形成优势，反被清军总兵韩勋集中优势兵力，将义军打败。义军出师不利，包利、银红随即率领起义军转移到清江、台拱之间，在这里，起义军得到了藏弩等数百个村寨苗族人民的支持，义军迅速增加到二万多人，声势大振。包利、银红率领大队义军向台拱进军，包围了清军防守的据点番招屯，义军不断发动攻势，清军据险死守，义军眼看清军援军即至，便撤围移住清江摆尾。吃一堑，长一智，包利、银红总结几次交锋的教训，开始明白对清军有强力固守的营汛据点，不能一味强攻硬打，在战术上要机智灵活，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清军无法弄清义军的意图，然后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攻其薄弱环节。根据这一战术原则，包利重新调整了义军的部署，集中优势兵力，乘敌不备，迅速把摆尾一带清军传送消息文书的孤立分散的

塘房一律摧毁，卡断台拱与清江清军的联系，并虚张声势，扬言要一举攻占清江。此时，驻防清江的文官武将宋厚、曾长治等真伪难辨，被数万义军的声势吓昏了头，连夜派出快骑向省城大员告警，又向四周清军驻守的营汛及州县告急。于是远自贵阳近及附近营汛、州县纷纷出兵增援解围。清兵提督哈元生、镇远总兵卜万年接清江警报，立即调拨清军数支火速增援清江。正当这些清军急如星火地向清江疾进，却被埋伏于交汪、莲花等地的义军及群众截击，使其进退不得。这时，包利乘内地州府县城清军抽调往援清江，防守空虚，便将义军主力从清江撤走，向内地州府大举进兵。自5月1日到6月11日共四十多天的时间，起义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攻下了镇远府的邛水司、胜秉、柳罗营、凯里、重安江、黄平、岩门新司、岩门旧司、黄平旧州、余庆、排略等州、县、营、汛，转瞬之间整个黔东南都为包利义军掀起的革命巨浪淹没。义军兵锋所指，莫不土崩瓦解，如排略一仗，驻守“官兵五百人，得脱者九十余人”，几乎全部被歼。

包利指挥苗民义军打击清军，尤其注重严惩那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地主官僚。包利领义军攻下清平县、黄平州，处决了清平县典史邵焕麟、黄平州把总黄进忠等文武官吏数十人。义军对反动官僚的严厉镇压，使作恶多端的文官武将胆颤心惊，丧魂落魄，如余庆知县朱若奇闻义军至，即弃城逃命；黄平州千总金升悉变惊慌鼠窜，知州罗鸣序畏罪自杀。还有那一贯作恶残害苗民的“土官”，苗民义军照例严惩不贷。包利带领义军讨伐岩门新旧两司，“土官”何

其仁、张纯全、冯秉义等，自知平时民愤极大，难逃人民的正义制裁，尽皆投水而毙。包利起义就是这样，无论满、汉、苗族的反动分子均一样镇压，显示了其对反动封建地主官僚斗争的坚决性与彻底性。

包利义军自改变战略战术后，既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又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清军被义军牵着鼻子走，处处被动，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疲于奔命。贵州当局顿感兵力不敷，至“省城戒严，驿路不通”。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提督哈元生不得不亲自出动，带领三百彪悍的卫兵到前线督阵。距离前线愈近愈觉包利义军人多势众，不可轻敌，哈元生一行到了平越之杨老驿，便就地驻扎，观望不前了。而此时的云贵总督尹继善看到贵州包利领导的苗民大起义声势浩大，烽火蔓延，唯恐这燎原之火烧到自己直接管辖的滇省境内，由此清廷怪罪更无法辩解，也赶紧从云南抽调副将周仪等数支清军星夜增援贵州。包利探悉清军动向，下令暂时停止对平越、都匀的攻击，静观事态的演变，伺机战而胜之。清军将领对此却产生了错觉，以为包利义军已被源源而来的各路清军的“威势”所镇慑，不敢动弹。于是满、汉、苗各族地主官僚一时气焰复张，十分得意，他们相互勾结，向义军疯狂反扑。6月22日，余庆生员毛邺、石阡府地主郑嘉忠、石中印等一伙，暗中联络原从余庆逃走的清军败将王兆元、房育昆等辈，将余庆夺回。贵州提督哈元生见此也认为大好时机到来，急令纪龙、哈尚德带领清军攻击驻守重安江的苗族义军，妄图一举“开通大路”。原来义军占领的地

区很宽，分兵驻守，力量单薄，易被敌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因此大风洞、打铁关、黄平新旧二城、重安江、凯里先后皆易手。有鉴于此，包利决定收缩，集中兵力，并避开清军的锐气，不与优势的清军决战，迅速将义军转移到古州、丹江一带，以优势兵力拔掉突出孤立于苗族义军中心区的清军据点，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根据地，然后一面休整，一面作好迎战的准备，以逸待劳，抗击来犯之敌。这次云、贵清军分数路围剿包利统率的苗族义军，虽然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义军主力却完整无损。当其纷纷“凯旋”之时，包利又指挥义军展开了新的攻势，从六月下旬到七月底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义军捷报频传，一鼓作气占领了丹江、清溪等县城，并对沿途清军的营、汛、据点分割包围，断其粮饷。由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等地清军驻守营地一片惊慌，急急派出警骑向各方请求紧急增援。

古州“苗乱”复炽，清廷朝野震惊！雍正皇帝气急败坏，大叫大嚷，对包利所统苗族义军，定要“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貽后患。”并痛斥剿办文武官员无能，决心亲自布置剿苗事宜。下诏由中枢重臣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庆复、张照等十三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负责统筹策划镇压贵州的“苗乱”。再从全国抽调重兵加强镇压的军事力量。加哈元生“扬威将军”头衔，统领川、滇、黔三省“汉土官兵”万余人，负责凯里等地清水江上游一带军务；另命湖南提督董芳加“副将军”衔，统辖湖、两广四省兵马万余，负责镇远等地清水下游一带军务；

并派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理兵马钱粮赈恤事务，委副都御史德希寿任张的副手。此外，雍正皇帝还下令布置：于广西、湖南两省邻近黔东南的地区增兵防堵；抽调河北、热河、浙江、湖广四路官兵共五千人驻守常德，防止贵州“苗乱”蔓延扩散到邻省。为与军事镇压密切配合，雍正皇帝又采取了安抚的措施。六月下诏指示贵州相邻各省官府“赈恤贵州难民”，九月又下诏免贵州当年“通省钱粮”，尤其是“苗乱”纷扰过的州县都一律“蠲免三年”，借以从政治上软化、瓦解苗族义军。

一当雍正皇帝安排停当，属下文武便密锣紧鼓喧闹起来，一场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立刻就要在黔东南铺开。雍正皇帝对自己的高招十分得意，只待捷报午门献俘。按雍正的既定方略，第一线的哈元生、董芳首先向苗族义军全面反扑。1735年6月，董芳统率清军进驻镇远府属的八弓，随即气势汹汹地向苗区展开攻势，而且还来了一个“先礼而后兵”的政治宣传。董芳派人四处游说：清军除六甫、寨头等十九个顽固反清的村寨外，“其余不分首从，概行招抚”。在清军反复的欺骗宣传下，果然有少数苗胞上当受骗。7月，有八寨厅属牙门、九门等寨苗民六百余轻信“受抚”，全部被清军惨杀于卞乌河。血的教训使广大苗民擦亮了眼睛，终于认清了清军嗜血成性的狰狞面目。这时哈元生则率领清军主力，连营数百里，张开血盆大口，杀气腾腾地从清溪西上至杨老驿全面开花。意欲一举由大路打通苗区营汛。妄图以优势的兵力将包利领导的苗族义军重重包围一举消

灭。

面对凶残强暴的清军，包利沉着应战，以静制动，以退为攻，避其锐锋，伺机反击。他依靠广大群众的帮助，在包围圈中运动游击。时间稍久，清军由骄而惰，锐气大减，加以战线太长，驻兵分散，至“兵愈多而愈不敷用”。于是包利不失时机地组织义军进行反击。义军以擅长的游击战术，并借助有利的地利、人和条件，声东击西，频繁地对驻守于清平、黄平、施秉一带大路的清军日夜进行骚扰袭击，清军昼夜难安，疲于奔命，士气一蹶不振。苗族义军乘机袭击稿贡、丹江驻守清军，斩杀清军守备林士昌以下“汉土军官”二十多人。义军进围驻守丹江清军，从六月到十月，官兵几乎粮尽炊灭，饿死者甚众。而驻守其他营汛的清军因义军不停袭击，也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各处营汛惊呼义军“锐不可当”，四面告警求援。一度神气十足的统军大员哈元生，犹如足陷沼泽，此时他“奔走不暇，顾此失彼”，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对清军如此狼狈不堪的处境，连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雍正皇帝也迭声哀叹：“所谓恢复不过空城，所谓开通也多阻截”。由他亲手策划并有众多谋臣献计献策而精心编织的荡平苗乱的大围剿，在包利、银红领导的苗族义军及根据地广大苗民英勇顽强的打击下，还是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包利、银红领导苗族义军粉碎清军围剿的重大胜利，在清王朝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雍正皇帝迫不得已，用所谓“轻率误信”的话来为自己开脱；为追究失败之责，将鄂尔泰免去大学士职务并削掉伯爵的头衔；尚

书张照感到苗疆事务棘手，甚至奏请皇帝干脆放弃苗疆，退守内地。至于贵州府县官吏更是视义军若洪水猛兽，谈之变色。为此平越知府朱启东佯称重病，请求告假还乡治理，借此远窜，苟全性命。

1735年9月，雍正皇帝驾崩，新即位的乾隆皇帝继续镇压贵州包利、银红领导的苗民起义。乾隆皇帝总结了清军一再失败的教训，重新调整了部署，不惜血本，投入更大的赌注，务必将这场苗乱镇压下去。乾隆的手段是：一面以刑罚立威，对原负责贵州剿办苗乱的军政官员张照、哈元生、查芳、元展成等分别查处；一面走马换将，精心挑选了湖广总督张广泗代替张照，并加“经略”的头衔，兼任贵州巡抚。乾隆之所以看中张广泗，因其是熟悉苗疆事务的里手。这位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前贵州巡抚，过去就是靠残酷屠杀苗族人民发迹，他对苗民充满仇恨，奸狡巨滑，心狠手毒，且富于反革命的经验；三是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源源不断从全国抽调劲旅汇集贵州。由是张广泗捧着乾隆皇帝的“圣旨”，指挥着七省汇集的清军劲旅，铺天盖地般向义军直压过来。包利审时度势，见敌人力量强大，来势凶猛，决战与固守均不利，便统率苗族义军从古州一带退守清江、高坡、丹江、山苗等地，以防御为主，相机以小部队进行袭击。义军在防守的地区，分别以人多地势险要的大寨为中心，联合周围小寨相互声援，形成一支一支的攻击力量，不断袭击清军，在局部上打了不少胜仗。但这次清军与前不同，既人多势众，补给充足，而且不急于夺取地盘分兵驻守，始终保持